

# “雅各宾主义的中国”：再论民初的政争、党争与政治失序

沈洁

民国元年，辜鸿铭曾给一位名叫赫尔的德国牧师写过一封题为“雅各宾主义的中国”的长信，借用马太·阿诺德有关“群氓”的概念，以及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激进共和主义的“恐怖统治”，评说辛亥革命及袁氏当国是一场“群氓的狂欢”。在辜鸿铭看来，中国真正的灾难不是革命，也不是伴随革命的流血和财产破坏，而是革命以袁世凯成为共和国总统而告终；他身上，集中了所有的“群氓精神”，不仅毁弃中华民族的廉耻和责任感，而且毁弃了大清王朝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的政教、文明。<sup>①</sup>辜鸿铭从道德和伦理的话题入手，评鹭袁世凯。看上去，他针对的仅为个人品质，但我们从这个议题出发，再去观察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可以看到，袁氏的这些“道德之亏”，实际上正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治理危机——无法为秩序提供一个绝对基础。

帝制终结，代表了“天命”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民心”“民意”。但问题在于，袁世凯以弄权接掌民国，他背后究竟凝聚了多少“民心”“民意”，本身已足够令人怀疑；再加上立宪派、旧官僚的三心二意，革命派的强势对抗，新生的共和国已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度。所以黄远生说：“以国民之无根底，主动者之客气与感情，则革命之后，安得有善果！”<sup>②</sup>

与之相关的，是从共和肇建到洪宪帝制，这种逆转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从大妥协到政乱频仍，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正当性危机及其历史根源，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今人论这段历史，多系乎袁氏妄为，但回到1912年，祸端并非系于一方，“权威真空”早在旧制度终结之日，就已经酝酿并且汇聚。

袁氏个人是历史的一面，南、北之间天然的敌对关系则是另一面。南方革命政府推袁世凯为总统，却又通过各种方法力图将其置于“无权无为”的地位。按照孙中山2月13日的辞职咨文，袁氏就任新总统的条件除了迫使清帝退位、实现共和之外，还有额外的“约法三章”；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临时总统辞职后，参议院举定的新总统亲到南京受职时，孙大总统及国务员才算解职；新总统必须宣布遵守临时参议院制订的临时约法。更重要的是，通过《临时约法》限制袁氏权力。《临时约法》公布于1912年3月8日，共7章56条，以此为基础，组建一个以责任内阁制为基本原则的政府。<sup>③</sup>中华民国的政体采用责任内阁制而非总统制，是有具体历史因缘的。究竟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南京临时政府尚未成立之时，同盟会内部就存在分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实行总统制，这是考虑到中国不具备民主政治的政党基础和选民基础，并且有长达数千年的集权政治传统，选择总统制有利于国家稳定。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另一方则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赋予内阁更多权力。后经黄兴调和，劝服宋教仁，最后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也选择了总统制。但形势遽变，中华民国的总统从孙中山变成袁世凯。在仅仅十余天后，临时政府的政体组织原则也随之发生了大转折——弃总统制而行责任内阁制。目的很明确，架空袁世凯，赋予参议院以更大权力。宋教仁在改组国民党、积极投身国会政治的过程中，多次指责当世为不良政府，而他所开出的药方，就是尽量“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sup>④</sup>这正像黄远生所说的，“其视一国之总统也，日日叛贼而囚虏之”。梁启超也看出了议宪之人拥有无限制的“解散权”，极易滥用，“足以腐蚀国会之空气，其贻祸国家乃无极耳”。<sup>⑤</sup>这意味着，在约法设定的制度规范中，议会可以对总统作种种限制，而总统却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在南方军、政实力远无法与北方抗衡的情况下，这种制度设计势必遭到强势抵制。

未出意外，党人一厢情愿的做法立刻遭遇反弹。《临时约法》导致此后连番而来的政府危机。民国成立

① 辜鸿铭：《雅各宾主义的中国》，辜鸿铭著，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册，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284-293页。

② 黄远庸：《远生遗著，黄远生遗著附录》卷1，“民国丛书”第二编第9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105页。

③ 《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6-110页。

④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9页。

⑤ 梁启超：《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

后的起首两届内阁——唐绍仪内阁和陆徵祥内阁——只分别持续了三个多月和两个月。导致内阁迅速垮台的原因，就是因为内阁总理夹在袁世凯总统府与同盟会阁员中间，无法独立行使行政权，导致冲突日益尖锐，最后不得不通过辞职解决。唐内阁倒台的导火线，是为任命直隶都督一事引发的府院冲突。王芝祥是南京留守府的军事顾问，被顺直议会推举为直隶都督。唐绍仪出于与同盟会关系的考虑，同意了。而袁世凯拒不接受由非北洋系军人督直，准备改命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袁世凯在与唐绍仪商量不果的情况下，直接下了总统令，也未按《临时约法》规定经唐绍仪副署。唐一怒之下称病出走天津，随即辞职。之后上台的陆徵祥内阁，提名六位增补阁员名单，被宋教仁主导的参议院多数党悉数否决，再次逼拶陆徵祥称病辞职。党派阁员以否决权胁迫内阁辞职，这当然是一种“民国”，但与此同时，也使得这个新生的宪政国家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章太炎评说“名曰议员，实为奸府”，至政务停顿，人才淹滞，他建议袁世凯“勿容拘牵约法”，便宜行事。<sup>①</sup>同盟会阁员的强势之举，已经在实际上妨害了政治的正常展开。顺势，便是宋案发生及其对政局的转折性影响。

这里，简单谈一谈宋案。宋教仁的政治理想以排袁作为基本预设点，蔡元培后来在为宋教仁的自传作序时，就明确说过，宋“以为有此多数党为大本营，足以操纵袁氏。既而知袁氏终不足与有为，乃舍袁就黎，遂以此触袁氏之忌，而先生死矣”。<sup>②</sup>关于宋案的来龙去脉，时人、政论家、史家已多有论述，不再作详辨。重要的是，宋教仁被刺关涉的远不止宋、袁之间的恩怨纠葛，而在于，以此为中心所扩及、牵扯到的民初政治格局中纷繁复杂的利益群体。同盟会、北洋、进步党、研究系，以及林林总总的政团、政客，穿梭其间，不仅是权力的纷争，还有他们各自对于共和、宪政不同的理念和行动方式。

宋案发生后，调查和庭审迅速展开，过程是及时并公开的。而国民党人却在尚无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断制造袁为主凶的舆论，倒袁之声甚嚣尘上。对于党人借证据未足的宋案行政治倒袁之实的做法，连一向持论平和的《申报》也发文评论对袁、赵的指责有失公允，一再建议国民党“国家无罪，亦无仇，我人不宜毁之”，希望在法律的范围而非政治的意气上解决宋案。<sup>③</sup>

二次革命期间，在反袁旗帜底下，革命派的许多言、行，恰恰也给了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停止两院议员职务的借口。比如参议院议长张继用李烈钧寄来的巨款收买议员，还号召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开议。以激进著称的何海鸣甚至主张“假托贼政府军队，肇衅英、俄，使外人从而干涉之”，等等。这些话写在李烈钧等人与国会议员徐秀钧等人来往的数十件密电中，被警备司令部查获。袁政府布告，国民党“不知有国家，只知有本党；不知有团体，只知有个人”，“推其用心，非该党自为政府，即须断送国家”。<sup>④</sup>在挽救国家危亡和减轻人民痛苦的名义下，采取非常措施解散国民党。并且，开始了随后一系列走向独裁的行动。从二次革命到解散国民党，从《中华民国约法》到《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再到洪宪帝制，在一连串的闹剧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党派纷争对袁世凯的步步进逼，甚或是塑造。这个过程中，袁世凯自然是“倒行逆施”，但他的对立面，也并未履行共和的原则。争端时，各政党均有为党派利益而违反共和原则的行为：各种合法与非法、公开与阴谋的手段交互使用，拉票冒投，无奇不有，抢票毁票时有发生，金钱收买，手枪相向，抵制投票也属司空见惯。各党惟党势是争，缺乏和平、公正的竞争意识。<sup>⑤</sup>而“共和”观念的混沌与淆乱，也是普遍的。位至阁员、议长，却“茫然不知共和为何事”。陆徵祥任国务总理，出席参议院报告施政方针，竟大谈请客、过生日、开菜单，而无一语涉及政治，致全院哗然。海军总长刘冠雄执礼认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为“长官”，时人感叹，“阁员而认议长为长官，真闻所未闻，如此愚暗无常识，乃令其参政地，国事尚可问乎？”<sup>⑥</sup>以帝制时代的官场作风，投身于共和政治的实践，不能不说，这是对“共和深

① 《章炳麟为请大总统便宜行事致黎元洪电》，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1页。

② 蔡元培：《〈我之历史〉序》，《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39页。

③ 《宋案证据发表》，《申报》1913年4月28日。

④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499-509页。

⑤ 参见徐辉琪：《论第一次国会选举》，《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⑥ 刘以芬：《民国史拾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入人心”的一种反讽。

梁漱溟在 1922 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sup>①</sup> 党人和袁氏，均意在独大。这种不肯妥协，就政治向度而言便造成了一种失序。因此，如果说民初存在“权威真空”的话，那也是多向度、多维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不是真空，而是多头权威，在互相的缠斗与制约中，致使政治走向无序和无休止的争端。

有关权威的争端，还远不止于党人与袁氏之间；在革命党内部，同样是大小山头，明争暗斗。正如陶菊隐所说，“革命尚未成功，牛鬼蛇神出现”<sup>②</sup>，描述的，正是民初中国乖乱的政局。袁世凯不具有统率党人的权威，党人更没有指挥北洋的能力，而孙中山在辛、壬之际及民国成立之初，也远不具有后世言论中的“国父”地位。南北和议期间，章太炎就公开说过，“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sup>③</sup>，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大不以为然。莫里循谈及对孙的观感：“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外国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sup>④</sup> 而在赣宁之役失败之际，革命党内部不仅没有因此更团结，却在互相攻讦，孙中山在东京责备黄兴不该放弃南京，私自出走，而黄则指责孙自行盲目运动军队，造成混乱局面。陈其美也与黄兴因军事责任问题发生争执。<sup>⑤</sup> 徐绍桢晚年评述二次革命迅速失败的原因，曾说：“时民党为都督者十六省，皆志满意得，卒为袁军所败，或且投械于袁，以图自保其功名富贵，是不能自哀而人哀之也。”<sup>⑥</sup> 熊十力也说过，辛亥后的革命党“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暴露浮器侈靡淫佚种种败德，“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sup>⑦</sup> 民党的内部矛盾、意气之争，使他们无法在军事、政治上团结一致，本身已经薄弱的力量又一再分化，败于袁氏之手便不足为奇。

民元开始，权威缺失、政争频仍造成的危害绵延此后数十年。钱端升在 1934 年一篇题为《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的文章中说：“我以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sup>⑧</sup> 钱氏为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专长于政治学、法学研究，他所针对的当然也并非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而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以后关于制定宪法及中国前途的论断。但他这番有关中国需要“独裁”的评述，我认为，正可以为我们回看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政治提供一个视角：由袁世凯、革命党、立宪派和满蒙贵族妥协而肇建的中华民国，以短短数月终结两千余年帝制，这中间必定存在大量脱节。旧制度将以各色面目、各色人物，出现在新的历史时间。权威真空、党派纷争、民众于新制之懵懂、帝制时代的种种遗留、伦理和意识的混乱，凡此种种，以不同形式映射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曲折与翻覆。<sup>⑨</sup>

按照韦伯的政治统治类型说，清代表传统类型；袁世凯以强权登顶，但他的强权显然无法统御革命党人，而所谓的“逼宫”又使他无法在更大多数的中国人群中建立卡里斯马型的权威。亦即，传统类型终结之后，法理型的统治却没有建立。可以说，当现代政治在中国奠基之时，权威就是缺失的。权威缺失及共和意识之混乱，后果就是民初的政治失序，现代建设被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与政乱所打断。由此，从辛亥革命转回

① 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梁漱溟全集》第 4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73-674 页。

② 陶菊隐：《袁世凯真相》，北京：线装书局，2008 年，第 148 页。

③ 李烈钧等：《党人三督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第 55 页。

④ [澳]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理循》，窦坤等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83 页。

⑤ 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方建文、张鸣主编：《百年春秋——二十世纪大事名人自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第 173-174 页。

⑥ 徐绍桢：《学寿堂日记》，（丙寅）正月初二日，第 12 页。转引自沈晓敏：《徐绍桢、孙中山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⑦ 熊十力：《英雄造时势》，《熊十力全集》第 8 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73 页。

⑧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 号，1934 年。

⑨ 有关辛亥“大妥协”及一般社会“共和”观念的懵懂与缺失，可参见沈洁：《革命之后：“五族共和”的另一种叙事》，《读书》2012 年第 7 期；沈洁：《“家”“国”与“满”“汉”——再论清帝逊位和 1912 大妥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3 期。

到洪宪帝制，在失序中寻找秩序，尽管被证明是试误，但也构成了一种历史逻辑。直到北伐和国民革命爆发，由“党统”取代“法统”，历史再次转折。<sup>①</sup>我想到了鲁迅关于“反复”与“羸杂”二象的陈述：“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羸杂。”<sup>②</sup>反复和羸杂，是民初中国法统与权威问题的表象，也是帝制到共和转折过程中人心与世路的内里呈现。“共和”需要养成，而养成则需要过程。

[作者沈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235）。]

①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1年，第531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14页。

## 共和还是君主

### ——重思民国初期关于国体问题的论争（1915—1917）

宋宏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仅倾覆了延续268年的清帝国，而且终结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其影响之深巨恐非后来任何历史事件所可比，这似乎也标志了君主制在中国的最终命运。不过，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君主制历史的国度，有关君主制的政治原则是否随着君主制的衰败而不再有效？

实际上，自民国肇建之始，同情乃至要求重建君主制的声音未曾停止过，宗社党、清遗民固无论矣，前清立宪派中的一批士人，甚至革命党中也有人主张规复君主制。他们所言的君主制并非传统的帝制，而是清末新政中未曾实现的君主立宪。这种思虑愿想最终化为两场迅速归于失败的重建君主制的运动。值得玩味的是，无论是称帝的袁世凯还是复辟清室的张勋，身败之余，均被口诛笔伐，双双钉上了历史耻辱柱。此后，君主制如同不祥之物，令诸多政治人物避之唯恐不及，它难以成为一个政治选项，反而变为抹黑政治对手的符谶。

正是由于君主制在中国的这一奇特命运，在两次重建君主制的运动中出现的围绕国体问题的论争也就很少得到认真对待，通常只是简单地将赞成君宪一方的言论视为复辟运动的舆论工具而已。<sup>①</sup>本文通过呈现论争各方对民国初期政治的多种思考，并透过对论争内容的分析，重新考察大体发生在1915—1917年间的关于国体问题的论争，从政治思想层面，就论争所涉及的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中有关国家象征和政治权威的问题，做一简要的分析。

#### 一、国体问题论争的先声与语境

这场有关共和与君宪何者为宜的思想论争，就其缘起来说，显然要追溯到清末关于革命和君宪的大讨论。所谓国体问题，某种程度上或可视为当年未曾解决的问题在已然不同的政治语境下的延续。实际上，早在

① 近来已有一些从学理层面平情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著，如林志宏对清遗民的政治观念的考察（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第四章），章永乐从政治史角度对民国两次重建君主制失败原因的探讨（见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六章），邓丽兰对《甲寅》《新中华》杂志上的相关言论所做梳理和分析（邓丽兰：《君主与共和：国体之争的再认识——以〈甲寅〉〈新中华〉为中心》，载刘泽华等主编《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李云波：《略论1915年之“国体”讨论》，吉林大学文学院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此外，关于论争中具体人物思想的研究不少，如曾亦：《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以西化与华化相对,“其故可深长思之”!<sup>①</sup>这套文化性的,基于民族主义之“可爱”的国家认同为抗战期间在日据北平苦熬岁月的陈垣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他不仅写出了另一部名著《通鉴胡注表微》来表露自己誓不屈敌的心迹,而且强调说“昔之言氏族也,利言其分,所以严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也,利言其合,然后见中华之大。分之则无益于国家,无益于民族”!<sup>②</sup>

第二个则是如何在塑造国家认同中激发中国人的大国民心态。无疑今日中国正在崛起,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体与经济体之一。但在国家认同的塑造中中国人经常并不太知道怎样去做一个“大国民”。这自然与前文所述绵延至今因尊西崇新而只知追赶美德英法等列强,并关注列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风气有关,这种风气使得中国传统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智慧往往隐而不彰,其实孟子所谓各国间“事大字小”的原则恰能够为中国人培养“大国民心态”提供古老却弥新的资源。“事大字小”说的是小国对大国的侍奉和大国对小国的爱护,其核心在以礼(实质就是文化)划分国家等级,又以礼而非强力联结大国、小国,造成一个看似松散却又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国际体系。在此体系里强调国与国之间互相的责任,尤其是大国对于小国的责任,而不是利益的计算,这使得传统时代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总是不缺心系小国,包容小国的大国民心态。即使在清末作为主权国家在各国中实际地位甚低微的时候,章太炎等仍从来源于历史、语言、风俗的“固已潜在”的“民族根性”出发说“欲圆满民族主义者,则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处于完全独立之地”<sup>③</sup>;“且以为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sup>④</sup>此种因民族主义之“可爱”而推向世界主义乃至“禽雀牲畜”等一切生物的看法,正论证了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所说“爱国同时也可作世界公民”理想的可能性<sup>⑤</sup>,值得我们一再深思。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化研究(1895-1919)”(11CZS057),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11PJC04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200241)。]

(本专题讨论责任编辑:张洪彬)

① 陈智超前言,收入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4页。

② 陈垣:《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36页。

③ 章太炎:《五无论》,张树、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55页。

④ 章太炎:《定复仇之是非》,张树、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70页。

⑤ 臧继贤:《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爱国同时也可做世界公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6050,2015年1月28日访问。

## Multiple Creation of Identity of State in Modern China (Symposium)

Xu Jilin, Shen Jie, Song Hong, Yan Quan & Qu Jun

**Abstract:** Xu Jilin believes that the politics of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ational Period was at chaos because a lack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What the political forces scramble was only the political power, resulting in the chance of re-construct the authority of state time and again. Shen Jie holds that it was the multiple authorities, i.e., a multi-layer scramble between warlords and KMT, between the warlords, and among KMT factions, caused endlessly political disorder. Song Hong puts up that the suggestion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had an obvious ground of public opinion, but it failed because of many difficulties in reality. Yan Quan mentioned the advocate of provincial constitution for local power in early national period, and believes that, in 1923,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had created a federal power divis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it was soon disrupted by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Qu Jun points ou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molding a state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the “treasure” of nationalism wa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nd its “loveliness” was neglected..

**Key word:** Revolution of 1911, state authority, state power, state identity, nationalism